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当代抗战小说《酒坊巷》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高小雪，李正栓 *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00
DOI:10.61369/HASS.2026060010

摘　　要： 古兰月所著当代抗战小说《酒坊巷》以浙东抗日根据地为叙事背景，通过酒坊巷这一典型空间载体，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作为一部富含地域文化特质与历史记忆的作品，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军官人名、中国地名、军事组织名等专有名词构成了独特的文化负载词系统，其英译直接关系到革命叙事的历史真实性与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跨文化传递效度。本研究以《酒坊巷》原文及李正栓英译本为语料基础，采用案例分析法，聚焦作品中三类核心文化负载词，并从译内与译外双维视角对其展开考察。研究发现，专名英译的关键决策多由 “翻译外” 因素驱动，译词准确性取决于译者对历史事实的考辨深度；译者行为在 “求真—务实” 连续统上并非固定于某一端点，而是呈灵活滑移态势。依托历史考辨支撑翻译评价、借助词典语义划定词汇适配边界，能够突破单一宏观策略分类的研究局限，厘清译词选择背后的历史理据，直观展现译者在 “求真” 与 “务实” 二者间动态调适的内在逻辑，也可为抗战文学外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提供可资借鉴的操作范式。

关 键 词： 抗战文学翻译；《酒坊巷》；文化负载词；李正栓译本；译者行为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Terms in the Contemporary Anti-Japanese War Novel *Winery La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Gao Xiaoxue, Li Zhengshu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Abstract: Gu Lanyue's contemporary anti-Japanese war novel *Winery Lane* is set against the narrative backdrop of the Eastern Zhe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rough the typical spatial carrier of Jiufang Lane, the novel showcases the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national integrity of ordinary civilian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a work rich in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memory, the novel contains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proper nouns, military officer names, Chinese place names,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names, that constitute a distinctive system of culture-loaded term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se terms directly concerns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ves and the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efficacy of red cultural spirit. This study takes the original text of *Winery Lane* and Li Zhengshuan'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the corpus foundation, employ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to focus on three categories of core culture-loaded terms and examining them from dual perspectives of intra-translation and extra-transl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key decis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proper names are predominantly driven by "extra-translation" factors, and the accuracy of translated terms depends on the translator's depth of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ranslator behavior does not remain fixed at either endpoint of the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 but rather exhibits a flexible sliding pattern. Relying o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o support translation evaluation and utilizing dictionary semantics to delimit the boundaries of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can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single macro-level strategy classification, clarify the historical rationale behind lexical choices, and intuitively demonstrat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ranslators' dynamic adaptation between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thereby providing a referential operational paradigm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terms in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Winery Lane*; culture-loaded terms; Li Zhengshuan's translation; translator behavior**

作者简介：高小雪（1998—），女，河北邯郸人，硕士，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通讯作者：李正栓（1963—），男，河北保定人，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研究。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在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浙江籍作家胡毅萍（笔名：古兰月）创作的长篇小说《酒坊巷》以浙东抗日根据地为叙事背景，通过酒坊巷这一典型空间载体，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作为承载中国革命记忆与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学作品，该小说的英译传播直接关系到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跨文化传递。而与古典文学、现当代乡土文学在海外译介的丰硕成果相比，抗战小说外译研究尚付阙如。此外，现有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多聚焦文化典籍与外宣话语，或基于认知语言学探讨译者内部认知机制[2]–[4]，或借助生态翻译学、功能主义考察译者与外部环境互动[5]–[7]，社会学视角与数字化方法亦有所拓展[8]–[12]。然而，上述研究未能充分关注译者主体性，难以解释抗战文学翻译中“保留历史真实”与“满足读者接受”之间的译者主动权衡。鉴于此，本文以《酒坊巷》英译本为考察中心，引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翻译内（文本层面的语码转换与意义再现）与翻译外（历史语境、政治属性、读者接受等社会性因素）两个维度[13]106，聚焦军官人名、中国地名、军事组织名三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旨在揭示译者在文化忠实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动态调适机制，为红色文学外译提供可资借鉴的操作范式。

一、《酒坊巷》文化负载词类型学分析

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反映特定民族独特活动方式的词、词组和习语[14]232。现有研究多从文化领域角度将其分为生态、物质、社会等类别[15]，但对于军官人名、地名、组织名等专有名词而言，其往往横跨多类，难以据此分析翻译策略。Aixelá以“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 CSIs）指涉同一现象，并按语言形态将其界分为专有名词（proper nouns）与普通表达（common expressions）[16]58，前者因形式稳定、文化锚定性强而具有相对规律的翻译策略。本文据此聚焦专有名词子类，以《酒坊巷》中的军官人名、中国地名、军事组织名为考察对象，对其翻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

二、三类核心文化负载词的语料统计与特征

（一）文化负载词来源与选取标准

本节以《酒坊巷》原文及李正栓英译本为封闭语料，依据Aixelá对文化专有项中“专有名词”的界定，提取具有特定历史指向与政治意涵的军官人名、地名及军事组织名。统计采用人工标注与双人复核方式，确保语料边界清晰。

（二）文化负载词及英译

共产党（浙东敌后抗日游击队）所涉军官共6位，分别为：“沈致远”任浙东敌后抗日游击队大队长，英译为“Shen Zhiyuan, the battalion commander of 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Unit behind enemy lines in eastern Zhejiang”[17]1*；“徐天立”任游击队副大队长，英译为“Xu Tianli, the deputy battalion commander”；“杨本初”亦为副大队长，英译为“Yang Benchu, another deputy battalion commander”；“方文正”任游击队一中队队长，英译为“Fang Wenzheng, the 1st company commander”；“唐振华”兼具敌后抗日游击队成员与地下工作者双重身份，英译为“Tang Zhenhua, an underground worker”；“赵钟为”为游击队文书，英译为“Clerk Zhao”。

日本军官（陆军及宪兵队系统）所涉军官共5位，分别为：“酒井直次”任日本陆军中将、第15师团师团长，英译为“Sakai Naotsugu, Lieutenant General and Commander of the 15th Division of the Japanese Army”；“武田春树”任日本陆军少佐（后降为少尉）、驻金华宪兵队队长，英译为“Major Takeda”；“桥本”任日本陆军上尉、宪兵队军官，英译为“Captain Hashimoto”；“村上”任日本陆军少尉、宪兵队军官，英译为“Second Lieutenant Murakami”；“石井”任日本陆军中尉与宪兵队军官，英译为“First Lieutenant Ishii”。

中国抗日军事组织共涉及两大阵营及所辖5支具体力量：在共产党方面，“共产党”为敌后抗战核心力量，英译为“Communist Party”，其下辖“浙东敌后抗日游击队”活动于浙东山区，英译为“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Unit behind enemy lines in eastern Zhejiang”，另有“台湾义勇队”于1939年由李友邦在金华发起，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驻酒坊巷并开设台湾医院，英译为“Taiwan Volunteer Group”。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为正面战场作战部队，英译为“Kuomintang”，其下辖“第三战区”为国军战区建制，于浙赣会战中集结二十六万兵力迎战日寇，英译为“The Kuomintang Army’s Third War Zone”。

日本侵华军事组织以“日本陆军”为总体建制，英译为“The Japanese Army”，其下辖“日军第十五师团”竭力推行“三光”政策，英译为“The 15th Division of the Japanese Army”，及“日军驻金华宪兵队”负责金华占领区治安、情报与恐怖统治，英译为“The Kempeitai in Jinhua”；另有伪军协助日军，与之合称“日伪军”，英译为“Puppet troops”。

中国地名共5处，分别为：“酒坊巷”地处古子城中轴线，为故事核心发生地，英译为“Winery Lane”；“古子城”为婺州古城核心，金华千年建城史的核心区，英译为“Guzicheng (the Old City of Jinhua)”；“八咏楼”始建于南朝，位于古子城内，李清照等曾题咏，英译为“Bayong Tower”；“酒泉井”位于酒坊巷，清光绪年间金华知府继良命名，英译为“Jiuquan Well”；“大佛寺”又称石佛

1 * 下文英文引文均出自 *Winery Lane*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寺，距金华主城区约四十里，后山崖有千年龙爪樟，英译为“Buddhist Temple”。

（三）文化负载词及英译特征

这些文化负载词在源语中人物、组织或地点首次出现的位置，不只是简单命名，更承担着首次建构人物身份、组织属性与空间坐标的核心功能；其英译则体现出强烈的功能导向，即以“专有名词+同位语”为框架交代人物及其身份。对中方军官人名，译者倾向于求真于史实，基本采用全名拼音加完整职衔描述（如：Shen Zhiyuan, the commander of …）；就日方军官人名而言，原文信息完整度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译者的求真限度。高级将领如“酒井直次”姓名齐全，译文亦给出全名与军衔职务的全称，求真程度较高。而“桥本”“村上”“石井”等原文中仅存姓氏而无名字，译文便忠实于源语，统一处理为“军衔+姓”（如：Captain Hashimoto, Second Lieutenant Murakami, First Lieutenant Ishii），不增译名字以求完形，这种由史料残缺造成的留白，成为后续案例分析中值得关注的翻译伦理与历史叙事问题。对地名与组织名，译者采用阐释性意译（Winery Lane）、异化音译（Guzicheng）或约定俗成的译法（Communist Party）等，务实倾向明显。

三、《酒坊巷》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实证分析

（一）军官人名的语言特征及历史敏感性

军官人名在文本内部和外部均具敏感性，其翻译牵涉复杂的史实考辨。中共游击队六名军官均为“单姓+双名”结构，语义嵌入儒家伦理与救亡话语（如：“致远”“振华”），姓名本身即为人物品格的预叙，而全名则构成对个体尊严的隐性强调。更为关键的是其职衔所涉及的军队建制：“浙东敌后抗日游击队”并非国民政府序列内的正式编制，而是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其采用“大队—中队”而非正规军的“营—连”建制，反映了非正规军的组织本质。这就需要译者在历史求真与现实站位之间审慎权衡：一方面需忠实于游击队在抗战时期的实际建制，避免以现代军队编制去正规化历史；另一方面，在英译建制称谓时，须充分考虑译文在当下国际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以合理的译法确保人民武装的历史面貌与国家形象得到准确呈现。与中共方面形成对照的是，日方军官人名在历史真实性上呈现真实与虚构之别，酒井直次为确凿可考的历史人物，其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的身份及1942年于浙赣会战触雷毙命的史实均有据可查；而“武田春树”“桥本”“村上”“石井”等则是源语作者基于历史情境虚构的人物。其姓氏在日语中较为典型且带有鲜明的日本文化标记，如：“武田”为武士阶层常见姓，“桥本”“村上”“石井”为典型地名姓，用以呈现日军宪兵队长与下级军官的典型形象，并为揭示其侵略罪行埋下伏笔。这番虚实交织的谱系使语料本身即成为历史正义的隐性表达，也为后续跨语际转换中“求真”的划定了基本边界。

1.军官人名翻译策略

以“沈致远”及其职衔“浙东敌后抗日游击队大队长”的英译为例，可清晰透视译者面临的“翻译内”与“翻译外”双重决策。

翻译内人名音译求真。“沈致远”译为“Shen Zhiyuan”，属于汉语拼音的常规转写，姓在前、名在后，不颠倒顺序，不添加解释，是专名翻译中求真于源语形式的策略。翻译外职衔英译务实。浙东抗日游击队的建制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1.5—1943.1）为灰色隐蔽期，部队“不用新四军名义和建制”，以“大队—中队”为基本编制分散活动；第二阶段（1943.1—1943.12）撤销灰色番号，改组为三北游击队，设司令、副司令，下辖支队，建制发展为“支队—大队—中队”，实现统一指挥但仍未公开新四军身份；第三阶段（1943.12—1945.1）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番号，建制保留“纵队—支队—大队”的游击架构，名义上隶属于新四军；第四阶段（1945.1—1945.7）编入苏浙军区第2纵队，增设旅级建制（第1旅、第2旅），建制升级为“纵队—旅—支队”[18]21-33。苏浙军区是新四军在江南设立的二级军区，司令员为粟裕，浙东游击纵队编入该军区，意味着其正式纳入新四军正规指挥体系，但建制上并未因此改为正规军的师—团—营制。小说背景设定于1942年浙赣战役时期，此时恰为浦东部队抵达浙东仅一年左右，力量尚弱，仍以灰色番号隐蔽活动时期。源语文本中“浙东敌后抗日游击队”这一泛称及“大队长”“副大队长”“一中队队长”的职衔设置，与这一阶段“不用新四军名义和建制”、以“大队—中队”为最高编制层级的特征完全吻合。基于此，译者将“大队长”译为“battalion commander”，而非单用“commander”，其理据在于：“commander”在英语中泛指任何层级指挥官，亦专指海军中校军衔，单用则建制信息缺失且存在歧义；而据历史文献记载，至1942年底浙东部队只有1500人左右[18]25，大队分设，每大队兵力与正规军营级规模大致相当，以“battalion commander”对标可向现代读者同时传达两层信息：其一为指挥层级（营级指挥官），其二为部队规模（数百人级别的作战单位）。这一译法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向务实端滑移，以现代军事术语对标历史规模，兼顾了术语精确性、读者认知与国家形象的正向建构。

（二）地名的空间叙事功能

在小说叙事中，地名不仅代表着故事发生的地理坐标，更承担着三重叙事功能：其一，激活场景联想：读者可根据地名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心中唤起特定的空间意象，如“酒坊巷”三字，读者一望便知此地与酿造有关，进而联想到巷弄幽深、酿酒飘香的场景；其二，赋予情感与立场：地名往往隐含作者对空间的情感态度或政治立场。其三，参与意义建构：地名与人物的行动和情节的演进相互嵌入，由此生成深层的叙事意义。

1. 中国地名翻译策略

“酒坊巷”的英译“Winery Lane”采用了阐释性意译，译者未将其音译为“Jiufangxiang”。从词典释义看，“winery”的语义存在广狭之别：Merriam-Webster取其广义，定义为“a wine-making establishment”，不限定原料，为“酒坊=酿酒场所”的对应留出了空间；Cambridge Dictionary则取其典型，定义为“a place where wine is made, especially from grapes that are grown there”，将“wine”与葡萄绑定，暗示“winery”在英语读者认知中更可能激活葡萄酒庄的场景联想。两相对照，“酒坊巷”源语语境中指向的是以稻米为原料的传统米酒、黄酒作坊，“winery”在酒的种类上确有部分偏差，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即英语读者联想到的是以葡萄为原料的西方酿酒场景，而非江南米酒作坊。然而，英语中缺乏能精确对应“米酒酿酒作坊”的日常词汇：“brewery”偏向啤酒酿造，“distillery”指向烈酒蒸馏，均无法与“酒坊”准确对接；“Jiufangxiang”虽求真于源语语音形式，却无法向英语读者传递任何与“酿酒”相关的场景信息。在此词汇空缺的条件下，译者以“winery”取“酿酒之地”的核心功能，以“lane”置换“巷”的街巷意象，使地名在首次出场时即能激活与“酿造”相关的场所联想，在地名语义的跨文化传递中实现了功能对等。酒种类的精确性因此被适度牺牲，属于阐释性意译在务实于读者认知过程中所付出的求真代价。

“酒坊巷”以意译激活场景联想，“古子城”则采用音译加注。金华古子城始建于汉末至三国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东汉初平二年（191）设长山县，县治位于今古子城一带；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分会稽郡西部置东阳郡，郡治设于长山县。长山由县治升格为郡治。作为中国古代“子城”建制的早期遗存之一，古子城是金华历代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郡治府署、文庙寺院皆聚于此，素有“两浙城池，惟婺为首”之誉。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吴越王钱镠于子城外筑罗城，形成“内子城外府城”的重城格局，原州城遂称“子城”，即今古子城。历经千年沧桑，古子城仍存八咏楼、侍王府、酒泉井等文物古迹，是金华城市之根、文化之魂[19]。其英译处理需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审慎权衡：若采用“Guzi Ancient District”，“Ancient District”向英语读者传达的是现代化城市中保留下来的一片古迹集中区，暗示古子城是金华这座现代城市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区划，而非金华城的历史本体，且“district”一词极易被理解为现代行政区划或功能分区，从而抹去“子城”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城市建制的独特文化含义，历史深度与政治地位尽失，“现代化”气质也与战争时代氛围不相协调。为此，译者最终采用“Guzicheng (the Old City of Jinhua)”：音译“Guzicheng”求真于源语语音形式，保留了专名的完整性和专属性；同位语注释“the Old City of Jinhua”务实于英语读者的认知需求，传递其“金华古城”的整体属性，即不是金华城中的一个区，而是金华的城市之根与历史文化核心，使读者在首次出场时即能激活“历史古城”的场景联想。这一处理在求真与务实之间找到了平衡路径，既避免了“Ancient District”的现代化歧义，也避免了纯意译可能带来的历史含混，是地名翻译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一次审慎而有效的实践。

“大佛寺”的英译则经历了从音译“Shifo Temple”到意译“Buddhist Temple”的修改。从“翻译内”看，这是从“音译专名+意译通名”到意译的策略转换，即由保留源语专名语音（Shifo）转向直接传递宗教功能属性（Buddhist）。从“翻译外”看，其动因在于，原文详述了该寺因“身高六丈的石佛”而得名的传奇渊源，并点明其如今为“金华地区最具佛教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正法道场”。对英语读者而言，“Shifo”或“Shifo Temple”无法激活“石佛端坐”的历史意象，更难以传达其作为区域佛教中心的核心宗教地位；“Buddhist Temple”则直接锚定其“正法道场”的功能本质，使读者首次接触时即可准确识别该地的宗教属性，避免了音译在特定文化意象上的空白。尽管“Temple”已提示“宗教场所”的类别框架，却无法传递“石佛”渊源与区域佛教中心的双重内涵。

反观“Bayong Tower”与“Jiuquan Well”，二者均取“音译专名+意译通名”的常规模式：“Bayong”“Jiuquan”虽对英语读者亦为陌生音节，但“八咏”因李清照题诗、“酒泉”因知府命名而具备文本内的独特阐释，音译后其文化意涵可在上下文中呈现；“Tower”“Well”则分别明晰了楼阁与井栏的实体属性，在“求真于源语称名”与“务实于读者认知”之间取得了恰切平衡。大佛寺之所以未沿用此模式，关键在于“石佛”作为专名虽在原文中有特定渊源，但音译后既无法保留“六丈石佛”的具象联想，也难以提示其“正法道场”的区域宗教地位；译者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向务实端滑移，优先传递寺院的宗教功能，以确保读者认知精准，并为此适度舍弃了对“石佛”意象与源语语音形式的忠实再现。

（三）组织名的政治属性及意识形态

相较于军官人名翻译中职衔称谓所引发的建制考辨，以及地名翻译中空间意象的跨文化传递，组织名的英译则直指另一核心问题，即政治属性如何在译入语中得以呈现。小说语料中涉及多类政治军事组织，既有“共产党”“国民党”等核心政治力量，亦有“浙东敌后抗日游击队”“台湾义勇队”等战时特定团体，还有“日军第十五师团”“伪军”等敌方或附敌武装。这些组织名称一旦进入英译，便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牵涉历史定性、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重构。译者如何在“求真”与“务实”之间权衡，如何在读者认知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取舍，是本节所要考察的核心议题。

1.组织名的翻译策略

台湾义勇队是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其档案时间横跨1939年至1945年，内容涵盖了义勇队队员从闽北山区崇安出发，在浙江金华成立，移驻闽西龙岩、闽南漳州、厦门，直至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荣归故里宝岛台湾的完整历程[20]19。译者初译为“Taiwan Volunteer Group”，后改译为“Taiwan Volunteer Team”。就“翻译内”而言，译者面临的是词汇选择问题：“Group”与“Team”均可对应中文的“队”，但二者语义指向不同。根据Merriam-Webster词典，“group”的军事义项为“a military unit consisting of a headquarters and attached battalions”，即由指挥部及附属若干营组成的军事单位，规模通常在数千人以上；其泛称义项则为“a number of individuals assembled together”，侧重个体的集合。“Team”的核心释义为“a number of persons associated together in work or activity”，即围绕共同工作或活动而协作的一群人，同义提示为“crew”“gang”，强调任务导向的协作集体，并不绑定特定的军事编制层级。

台湾义勇队1939年2月成立之初首批队员仅数十人，此后分七批自崇安赴浙逐步扩充，至1944年共有官佐队员322人、士兵59人，合计381人[20]15，始终是一个营级或略小于营级的作战队伍。若仅从现代军事编制的规模语义衡量，“group”的军事义项所暗示的数千人规模与台湾义勇队全期三百余人的实际体量存在明显落差；而其泛称义项虽可涵盖少数人，但在抗战史英译语境中，“group”更常被用于指称游击队、抵抗组织等非正规武装的通称，本身并无“松散”之贬义。然而，对于“义勇队”这一兼具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正式核准身份与中小规模特征的特定组织，译者需进一步考量词汇所携带的编制联想："group"在军事语境下易引发大型合成单位（如：航空大队、炮兵群）的联想，与台湾义勇队"由小到大、任务协作"的历史形象不尽吻合。

相较之下，"team"不预设特定军事编制层级，数十至数百人均可适用，其"为共同任务而协作"的语义内核，更贴合台湾义勇队从初创小队到三百余人抗日行动单位的组织性质——既避免了与超大规模军事集团的层级错位，又保留了武装救亡团体的任务导向与内部协作特征。据此，译者的改译之举，并非否定"group"在通用英语中的适用性，而是在特定历史规模与组织性质的约束下，以词汇选择求真的审慎操作。

与"台湾义勇队"英译不同，"国民党"的英译"Kuomintang"所涉及的并非词义适配问题，而是专有名称的拼写形式选择。就"翻译内"而言，译者面临的是音译系统的取舍：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下的规范拼写为"Guomindang"，而"Kuomintang"系威妥玛拼音系统下的历史拼法，二者均可对应"国民党"这一源语名称。就"翻译外"而言，这一选择受制于多重因素：其一，"Kuomintang"在英语世界中已作为该政党的固定指称沿用近百年，进入英语词汇系统并获词典收录，具有高度的约定俗成性和认知稳定性；其二，该拼法承载着国民党自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各个时期的历史存在，一旦替换为拼音形式，英语读者将无法将新拼写与既有的历史认知相链接；其三，在国际传播语境中，"Kuomintang"作为英语世界对该党的一贯称呼，已构成独立于源语拼音规范之外的话语事实，译者无权亦无需以拼音规范去纠正这一历史形成的外文称谓。因此，译者取"Kuomintang"而不取"Guomindang"，是在"翻译内"的拼音转写与"翻译外"的历史认知习惯之间，以务实于读者既有知识框架为优先的合理选择。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翻译内/翻译外"为分析框架，对军官人名、中国地名、军事组织名三类专有名词的英译进行了逐类考察，结论如下：其一，专名翻译中的诸多关键决策由"翻译外"因素驱动，翻译的准确性往往取决于译者对专名所涉及史实的考辨深度，如沈致远职衔译为"battalion commander"，是浙东游击队1942年实际规模这一历史事实介入译词选择的结果；古子城译为"Guzicheng (the Old City of Jinhua)"，是金华作为"城市之根"的历史身份，从根本上否定了以"Ancient District"这一现代概念对其进行误读；台湾义勇队由"Group"改译为"Team"，是该组织有番号、有编制的准军事性质在词汇层面寻求精确对应的结果。其二，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并非固定于某一端点，而是灵活滑移：职衔称谓偏向务实，以现代军事术语对标历史规模；地名翻译中既有偏向务实的意译"Winery Lane"，也有偏向求真的音译加注"Guzicheng"；组织名翻译中，以"Team"求真于组织性质，以"Kuomintang"务实于约定俗成。其三，本章以"翻译内—翻译外"二分框架组织分析，翻译内关涉音译/意译策略、词汇语义选择等语言调适，翻译外则引入历史文献、档案材料、词典释义作为译词合理性的判断依据，这一路径表明，专名翻译研究不能停留在策略分类的宏观描述层面，而须落实到具体案例中，以历史考辨支撑翻译评价，以词典语义界定词汇的适配边界。唯其如此，革命叙事的历史真实性与精神内核方能在跨文化传递中得到有效传递。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2.
[2] 管邦迪 , 向明友 . 翻译过程的概念整合新解 ——以《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为例 [J]. 外语教学 , 2024, 45(1):95-100.
[3] 于强福 , 盛晓晓 . 认知隐喻视角下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以《陕博日历 ·2021· 大唐花舞》为例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8(4):412-418.
[4] 李孝英 , 赵彦春 , 郭虹园 . 中医药文化负载词内涵挖掘及英译认知研究 ——以"阴""阳"为例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23, (2):90-96.
[5] 李瑞雪 , 刘佳 . 生态翻译视域下《长恨歌》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6, 48(1):15-20.
[6] 王杨 . 生态翻译视域下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研究 ——基于《儒林外史》译本和《活着》译本的分析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147-155.
[7] 张迪 , 刘洋 . 目的论视角下的陶瓷术语翻译 [J]. 中国科技翻译 , 2022, 35(4):40-42.
[8] 冯正斌 , 吴康明 . 资本视阈下的译者行为分析 ——以《人生》英译本为考察中心 [J]. 外国语文 , 2023, 39(2):122-129.
[9] 王成平 , 贾晓庆 . 文化自觉视域下《茶经》英译本的复译 [J]. 中国科技翻译 , 2025, 38(3):58-60+9.
[10] 冯全功 . 元翻译话语的具体表现与潜在作用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 2025, 47(5):67-80.
[11] 韩丹 , 张志军 . 基于语料库的《阿 Q 正传》俄译本翻译风格对比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23, (1):105-116+148.
[12] 钱玉彬 . 基于语料库的奥运外宣话语文化主题研究 [J]. 外语研究 , 2023, 40(2):18-24+45.
[13] 周领顺 . 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外"研究 ——兼作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与"文本 - 行为 - 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的比较 [J]. 中国外语 , 2024, 21(5):106-112.
[14] 廖七一 .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M].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00.
[15] Nida, E.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J]. Word, 1945, 1(2): 194-208.
[16] Aixelá, Javier F.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M]//Román Alvarez and M. Carmen-Á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52-78.
[17] Gu Lanyue. Winery Lane[M]. Translated by Li Zhengshuan, Gao Xiaox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Toronto Education Press Ltd., 2026.
[18] 吴敏超 . 浙东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再研究 [J]. 中共党史研究 , 2018, (9):21-33.
[19] 汪希燕 . 金华古子城 , 见证了金华从何处来 [EB/OL]. (2021-08-02). http://www.jhzx.gov.cn/art/2021/8/2/art_1229720145_2110.html.
[20] 苏雨晴 . 台湾义勇队档案研究 [D]. 福建师范大学 , 2024.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